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

齐鲁文化与 山东新文学

魏建 贾振勇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

齐鲁文化与 山东新文学

魏建 贾振勇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

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

魏建 贾振勇 著

责任编辑 侯建 邹树德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张 10 字数·200000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55—2405—2/G·2400

定价·15.5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 编	严家炎		
副主编	王富仁	钱理群	凌 宇
编 委	吴福辉	陈平原	王晓明
	赵 园	陈思和	李庆西
	季红真	罗成琰	颜 雄

总 序

严家炎

文学有地域性，这一事实似乎很早就受人注意。

《文心雕龙》称北方早出的《诗经》为“辞约而旨丰”，“事信而不诞”，是质朴的“训深稽古”之作；称南方后起的《楚辞》则为“瑰诡而惠巧”，“耀艳而深华”，并将此“奇文郁起”的原因归于“楚人之多才”^①，多少接触到地域与文学的关系。唐代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有意比较了南北朝时期南方和北方文风的殊异：

江左官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

^①参阅《宗经》、《辨骚》诸篇。

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①

他注意到了地理环境参预文学风格的形成，这一看法对后世文论家影响甚大。到法国 19 世纪文学史家丹纳，则在他的《英国文学史》引言中，明确地把地理环境与种族、时代并列，认作决定文学的三大因素。他们都把文学品种、风格的生成与地域条件挂起钩来，考察地域带给文学的影响，揭示了文学发展的某种客观真理。

可惜的是，他们对于地域的理解，注意力似乎过分集中在山川、气候、物产之类自然条件上，而对构成人文环境的诸般因素则相对忽视，这就可能流于机械和肤浅，不易说明地域对文学影响的那些复杂、深刻的方面。自然条件对人和文学当然有重大的意义，尤其在初民时代。但是，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决不仅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例如该地区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而且越到后来，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确切点说，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通过区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而起作用。即使自然条件，后来也是越发与本区域的人文因素紧密联结，透过区域文化的中间环节才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的。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古国，各少数民族固然有

^①《隋书》卷76。

不同于汉族的地区文化，就是在汉族居住的广大地区，由于历史沿革、地理环境以及诸种人文因素的殊异，也同样形成了许多具有不同质态的区域文化，例如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陕秦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闽台文化，岭南文化，客家文化，关东文化，等等。到近代，在沿海一带，还产生了上海、香港为代表的大都会文化。区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所说的传统文化，自然也包括近百年来对外开放过程中形成的新传统文化在内。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来说，区域文化产生了有时隐蔽、有时显著然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而且还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20世纪中国新文学是在西方近代文学的启迪下兴起的。但就具体作家而言，往往同时也接受着包括区域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时是潜移默化濡染，有时则是相当自觉的追求。以鲁迅为例，年轻时就喜爱绍兴目莲戏中“女吊”这样“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①，自己并曾参加演出。他对越文化极有感情，不但在辛亥前夕编定了有关会稽历史地理的逸文《会稽郡故书杂集》，而且悉心搜集乡邦先贤富于反抗思想和爱国精神的种种文献。鲁迅对宋代陆游、明末王思任等故乡杰出人物，尤其怀有深挚的敬意，晚年还在信中引王思任的

^①鲁迅《女吊》，《且介亭杂文末编》。

话说：“‘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①可见越文化对他精神气质渗透之深。鲁迅以外，沈从文之于楚文化，老舍之于京都文化，李劫人之于巴蜀文化，赵树理之于三晋文化，穆时英、张爱玲之于上海文化，柳青、陈忠实之于陕秦文化，大致情形莫不如此。因此，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来探讨 20 世纪中国文学，就构成一个新的重要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途径，它将使人们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认识获得进一步的深入和拓展，反过来，也将加深人们对不同区域文化特质的理解。这就是我们所以要编撰《20 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的缘由和宗旨。

从区域文化的角度研究 20 世纪中国文学，并不是要为各个地区撰写 20 世纪文学史，而是要选择那些有明显区域文化特征的重要作家、文学流派或作家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区域文化怎样渗透进了这种文学，为这种文学打上了多么独特的印记。这就提醒我们：撰写这类专著时大可不必求全，不必担心遗漏某些与区域文化关系不密切的流派、社团和作家。20 世纪中国文学出现过不少流派或作家群体，其中区域文化特征比较鲜明的，是海派、东北作家群、山药蛋派、京味小说等。像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七月派、九叶派，虽然文学史上颇有影响，却是跨地区的社团或流派，并无明显的区域特征，可以不进入我们的视野（至于其中某位作家的创作可能具有某种区域特征，则是另一回事）。作家也是如此。湖南作家很多，但如果研究湖南文学与楚文化，

^①鲁迅：致黄苹荪信，1936年2月10日。

那么恐怕应该抓住几位典型的作家如沈从文、叶蔚林、古华以及 50 年代的周立波等，有些作家可略而不谈。要研究四川文学与巴蜀文化，选择巴金也不太合适（虽然他是有重大贡献的大作家），而选取李劫人、沙汀则典型得多。总之，不在一个地区所有作家身上平均使用力气，正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该地区文学与文化的某些独有的特征。

从区域文化的角度研究 20 世纪中国文学，似乎还可注意抓取典型的具有区域特征的重要文学现象作为切入口。例如，浙江自“五四”新文学起来以后，出了那么多著名作家，各自成为一个方面的领袖人物和代表人物：鲁迅是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乡土小说和散文诗的开山祖；周作人是“人的文学”的倡导者，现代美文的开路人；茅盾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角，又是社会剖析派小说的领袖和开拓者；郁达夫则是另一个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健将，小说方面的主要代表，自叙传小说的创立者；徐志摩是新月社的主要诗人，新格律诗的倡导者；丰子恺则是散文方面一派的代表；等等。如果说“五四”时期文学的天空群星灿烂，那么，浙江上空的星星特别多，特别明亮。这种突出的文学现象应该怎样解释？除了越人自古以来自强不息、耻为人后这些文化心理因素之外，是不是和最近 100 多年浙江得风气之先，反清救国走在前列，去外国的留学生也特别多有关系呢？在浙江作家的小说中，我们确实最早看到了外国资本主义渗入所引起的种种变化，包括意识形态上的变化（如愿意买洋货，海员的家庭观念淡薄，市侩势利心日炽，等）；这些区域性的特点，是否和上述文学现象也密切关联呢？实在很值得研究者去思考和探

讨。从这个切入口进去，也许可以深挖出很多东西。

再如，鲁迅文字风格的锋利深刻，论辩时的善于击中要害，到底和浙江特产——“绍兴师爷笔法”有无关系？这同样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在鲁迅生前，早已有人提出过，甚至就此作过攻击，但鲁迅本人似乎并不回避。他在回答陈西滢所谓“刑名师爷”的指称时，态度相当鲜明：

……《西滢致志摩》是附带的对我的专论，虽然并非一案，却因为亲属关系而灭族，或文字狱的株连一般。灭族呀，株连呀，又有点“刑名师爷”口吻了，其实这是事实，法家不过给他起了一个名，所谓“正人君子”是不肯说的，虽然不妨这样做。此外如甲对乙先用流言，后来却说乙制造流言这一类事，“刑名师爷”的笔下就简括到只有两个字：“反噬”。呜呼，这实在形容得痛快淋漓。然而古语说，“察见渊鱼者不祥”，所以“刑名师爷”总没有好结果，这是我早经知道的。^①

不仅不想洗刷自己，反倒像是对刑名笔法的赞许了。有意思的是，作为浙江同乡和过来人的蒋梦麟，也在《谈中国新文艺运动》中回溯历史，肯定了师爷笔法和鲁迅文风的关系。他说：

“刑名钱谷酒，会稽之美。”这是越谚所称道的。刑

^①鲁迅：《不是信》，《华盖集续编》。

名讲刑法，钱谷讲民法，统称为绍兴师爷。宋南渡时把中央的图书律令，搬到了绍兴。前清末造，我们在绍兴的大宅子门前常见有“南渡世家”匾额，大概与宋室南渡有关系。绍兴人就把南渡的文物当成了吃饭家伙，享受了七百多年的专利，使全国官署没有一处无绍兴人，所谓“无绍不成衙”。因为熟谙法令律例，故知追求事实，辨别是非；亦善于歪曲事实，使是非混淆。因此养成了一种尖锐锋利的目光，精密深刻的头脑，舞文弄墨的习惯。相沿而成一种锋利、深刻、含幽默、好挖苦的士风，便产生了一部《阿Q正传》。^①

到底“刑名师爷笔法”应该怎样评价？它对鲁迅或其他作家有着怎样的影响？关于这些问题，钱理群先生在1988年出版的《心灵的探寻》一书中，曾作过很有见地的独到的研究。唐弢先生则不但在《鲁迅传》第一章中分析了“绍兴师爷”现象，还曾当面告诉我以后打算亲自查阅刑名师爷们制作的若干案卷，以便同鲁迅文风作更多实证性的比较（遗憾的是这一愿望未能实现）。所有这些，都启示我们：在研究区域文化和20世纪中国文学时，应该知难而进地探讨这类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

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的研究，涉及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宗教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中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等多种学科，难度比较

^①蒋梦麟：《新潮》，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初版，111—112页。

大，目前的主客观条件不能说很成熟。记得1989年在苏州举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会上，我曾建议杭州年会以“中国现代作家与吴越文化”为讨论主题之一，这个建议虽然得到理事会的赞同并通过，但后来的实际研究成果似乎不多。它可能就和学术界对区域文化的研究还刚刚起步，文学研究者对区域文化更是比较陌生，知识结构有待调整等状况有关。但正因为这样，决心朝这一方向进行开拓性的艰苦扎实的努力，更其显得可贵。

愿区域文化这一研究视角随着本丛书的面世而能引起更多文学研究者的重视，并结出大量丰硕的果实！

1994年4月11日初稿，6月30日修改补充

导语 在传统掌心上的山东新文学

溯观 20 世纪山东新文学的风雨历程，总感到齐鲁文化传统的魔力无处不在。20 世纪山东文学的灵魂总是在传统的掌心之上跳跃。王富仁先生最近在《大众日报》连载系列文章《咱山东人》，其中有段话挺有意思：“传统是很厉害的，它的厉害在于不论你知道不知道，反正你就得是这样的，孙悟空一个跟头打十万八千里，也打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可谓和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自家人谈自家人，总是冷暖自知。

不过文学和文化的姻缘是相当复杂的。关键在于齐鲁文化传统本身也是变动不居的，自诞生之日起，它就不断地“建构——扬弃——再建构”。它的一举一动都塑造着文学之河的形状和流向。如俞伯牙钟子期鸣琴相和，二者有天然的

深厚的血缘关系。但是有一点应该注意，就是传统以不变应万变，有一颗余韵不绝的“魂”，就是这“魂”牵动着 20 世纪山东新文学的吟唱和歌哭。

从“沂源人”到“东夷人”的文化源流变迁，从“齐、鲁文化”到“齐鲁文化”的合流，从齐鲁区域文化到民族传统文化的中坚，齐鲁文化之魂总是以令人荡气回肠的不屈生命力发展和再生。尽管几遭专制主义的扭曲和异化，但是它总是矢志不渝。应该说齐鲁儒学是齐鲁区域文化金声玉振的集大成者，体现了齐鲁区域文化忠贞不二的人文价值坐标。

并不轻松的是，目前学术界对齐鲁文化的研究还存在许多盲点，对齐鲁文化的界说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遑论齐鲁文化与齐鲁文学的姻缘。许多人以为齐鲁文化就是儒家文化，是很不确切的。齐鲁文化沿着“区域文化——儒家文化——民族传统文化”的路径演变之后，它的区域文化色彩尽管淡化了，但是它发轫之初形成的“魂”虽九死而犹生。一方面它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内核从而获得了大范围的传播普及，另一方面它又比其他任何一个区域的文化灵魂都要忠诚和坚执。事实上在先秦时代，齐鲁文化就形成了它的特质和品格，这就是它的非官方的正统性质、“崇德尚仁”的伦理特色和“士志于道”的古典人文精神。这一方面是其区域文化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也是它转化为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在根柢。据此，我们认为齐鲁区域文化在正统化、普及化的膨胀之中，促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儒主多辅”结构的形成。

齐鲁文化是一种在文化高峰时代形成的文化，尽管它曾经成为专制主义的思想统治工具，但是齐鲁文化固有的原始

人道主义风度、民本主义价值倾向、道德理性主义精神、文化守成主义策略和古典人文理想总是余音未衰，不绝如缕。尽管历朝历代都有面目可憎的齐鲁文士甘当鹰犬，为专制主义推波助澜，历朝历代也都有有识之士为恢复齐鲁文化的源初价值旨向而殚精竭虑。齐鲁文人曾经为伟大而崇高的历史文化使命而呕心沥血，“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可谓这种精神的光辉写照。

到了 20 世纪，古典的齐鲁文化精神实现了现代转化，齐鲁文学焕发出时代的文化品格。文学是文化最完整、最鲜活、最深层的表现形式之一，正是在观照 20 世纪山东新文学的心路历程中，我们认为它形成了别具区域特色的新传统，这就是它的文化守成主义、民间英雄主义和道德理性主义，一以贯之的是齐鲁文化的人文理想传统。这是 20 世纪山东新文学的强大的内在驱动力。因为这种精神向度反映了人类的根本精神走向和终极价值关怀，蕴涵着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问题的深沉思索。

我们不能不看到，齐鲁文化毕竟曾经站在封建专制主义文化铁血暴力的战车之上，也形成了一种影响至今的机械的、麻木的、僵化的精神气质。这种机械的、麻木的、僵化的精神气质像幽灵般徘徊，不知何时就会禁锢文学的头脑。20 世纪的齐鲁文人，一方面为齐鲁文化的人文理想而披坚执锐，另一方面却为这机械的、麻木的、僵化的精神气质所困惑。20 世纪山东新文学的翅膀总是那么沉重，这一方面是齐鲁文化的旨归使然，另一方面则是那机械的、麻木的、僵化的精神气质的束缚。

在本世纪的最后年代，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山东的文学创作正在显示出颇具生命力的文化走向。那种机械的、麻木的、僵化的精神气质的云烟在渐渐地消散，齐鲁文化的源初价值旨向在世纪末情绪围困的文学王国中，显示出迷人的时代的人文光彩，重新塑造了 20 世纪齐鲁文学的地域文化的时代价值尺度和精神风貌，成为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学的精神旗帜。

因为齐鲁文化和中国主流传统文化有着复杂而密切的联系，所以，尽管我们梳理出了齐鲁文化和齐鲁文学的一种关联和演变轨迹，但是我们深知，有待于开拓的学术空间仍然是广阔的。我们对齐鲁文化和 20 世纪山东新文学的血脉渊源的梳理和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更深层的挖掘。我们算是抛砖引玉，期待更多的专家、学者以及有兴趣的人士，畅抒自己的高见和宏论。

我们认为，对齐鲁文化和齐鲁文学的研究，其意义不能局限于一地一时的目的。“齐鲁区域文化——齐鲁儒家文化——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演绎历程，促使我们更多地思索它们之于中国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思索它们为人类精神的发展到底提供了多少有建设性的东西，以及有哪些经验教训可资借鉴。这是我们的一点陋见和拙识。

20 世纪就要逝去了，处于世纪之交的我们这一代，要比以往受到更大的推动去探索生活世界的神秘面孔。鲁迅先生几十年前的话，再次引起我们深深的共鸣：

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

人们向前进。

什么是路？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

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